

身體改造：清末民初的軍國民運動與國民覺醒

黃亦君*

近代中國是歷史上“身體改造”最為激烈的時期。本文以清末民初的軍國民運動⁽¹⁾與國民覺醒為視角，考察了軍國民運動給國民身體改造帶來的衝擊與影響。軍國民運動以國魂為召喚，以身體的軍事化開發、改造作為訴求和主張，毫不遮掩地呼籲中國應該將身體視為國富民強的根本基礎，引導着對國民身體加以國家化和社會化的意圖，這標誌着以民族主義、國家主義作為思想核心的中國近代身體觀開始正式形成。

近代中國是歷史上“身體改造”最為激烈的時期。隨着國內“身體史”研究的起步，學術界開始從“身體”出發重新認識和解讀中國近現代史，不過必須指出的是，目前大陸史學界在身體史領域的探索尚顯不足。⁽²⁾就現有研究可知，在很長一段時期裡，身體很少被視為可供研究的向度和視角。例如，在研究辛亥革命勝利後出臺的種種政策，卻很少考察“剪辮易服”引發的社會和心理變化；研究維新派關於改良風俗的設想，卻忽略了“反纏足”話語下纏足女性的情緒表達與思想流變；研究近代中國的逐漸成形和社會變遷，卻不追究近代中國國民性是怎樣形成的。事實上，作為中國歷史上千年未遇之變局，近代以來國民的“身體改造”表現得尤為突出和激烈，“身體改造”的幅度較大，內容亦十分豐富多彩。

由清政府推動的自強運動，變法、修律和教育改造運動，以及由民間智識分子發動的軍國民、新民、新文化和公民運動等，都和身體

的改造或再造有着直接的關聯。甚至以愛國作為名義的各種學生運動，也都對近代身體的型塑和使命化產生一定的強化作用。⁽³⁾

近代身體的形成離不開近代跌宕起伏的歷史背景，而要展開對近代歷史的深入研究，身體正是一個全新的視角。

—

晚近學界的“身體”討論都以笛卡兒作為批判之肇始。在笛卡兒處，“身體”代表着感性、偶然性、不確定性、錯覺和虛幻的一面。偶然性往往是事物的重要方面。恩格斯指出：

歷史事件似乎總的說來同樣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這種偶然性始終是受內部的隱藏着的規律支配的，而問題祇是在於發現這些規律。⁽⁴⁾

* 黃亦君，中共貴州省委黨校副教授，歷史學博士；研究方向：中國近現代史。

既然歷史是多個身體的總和，也就是說歷史的發展與偶然性緊密相連。歷史常常緣自身體的衝動，衝動其實就孕育着偶然性。事件的起源根植於“身體”，歷史的變遷可以在“身體”上找到痕跡，它在“身體”上刻下烙印，“身體”既是對“我思”、“意識”的消解，又是對歷史事件的銘寫。歷史和“身體”的銜接正是西方“身體”學者的致力和着眼之處。

這裡很有必要提及西方“身體”學者的兩個重要代表人物福柯和德勒茲。德勒茲的身體沒有遭遇到政治權力，或者說，這種身體正是要衝毀政治權力，它絲毫不顧及政治權力。但是，福柯的身體則和政治權力密切相關，正是在政治權力的有意干預下，身體發生了變化。

實際上，福柯的身體在可變性這一點上和德勒茲的身體概念有異曲同工之妙，二者都是流動的、變化的、靈活的、非穩固的、可塑的。身體在變化的過程中不停地增殖、展開，並且身體中的每個部分、每個細節都是自主的，不受主要器官所支配、主宰和壟斷——

有一種無政府式的身體，它的等級、區域化、排列，或者說它的整個有機性，正處於解體的過程中。(……)這是某種不可命名的東西，這個身體完全被快感所鍛造，它自我敞開、變緊、顫動、跳動、打呵欠。⁽⁵⁾

這樣，身體就會被各種力量型塑，在身體與外界碰撞的過程中經受種種訓練和折磨，饒有興味的是還被權力生產和鍛造。身體的不穩性和可變性，使它一定會和權力遭遇，一定會被權力有意地揉捏。由此，身體進入到權力的視野中，進入到社會的視野中，進入到機制的視野中，進入到歷史的視野中。

如果歷史和“身體”有無數的交接，如果事件可以反復地銘寫在“身體”上，那麼“身體”就具有反射性，也具有可變性；身體既影響了歷史，又受到歷史的影響。“身體”是怎樣受到歷

史的影響呢？關於這一點，福柯用身體的“權力技術學”和“政治經濟學”進行了回答。身體的可利用性、可訓練性、可改造性，它們如何被安排，如何被征服，如何被改造，如何被型塑，如何被訓練，都是由某種政治、經濟、權力來實施的，都是由歷史事件來實施的，都受到歷史事件的影響和干擾。正是在政治的干預下，身體發生了變化。政治和身體緊緊地連結在一起，政治對身體進行管理、改造、控制。身體的可變性是政治有意圖地來實施的，政治造就了身體的多樣性，身體是政治的產品和結果。在這裡，福柯關注的“身體政治”(body politics)，即將歷史事件置於身體政治的歷史脈絡中進行考察和解讀，透視政治和“權力機制如何同身體直接相關，如何同眾多身體、功能、生理過程、感官和快感相關；身體並沒有被抹去，有必要通過分析使身體變得可見”⁽⁶⁾。

身體的可塑性、可造性、流變性是身體史的前提。如果身體穩如磐石，一成不變，那還存在着一種豐富而多變的身體史嗎？它還能展示和不斷地銘寫歷史嗎？顯然不會。在譜系學家那裡，身體是可塑性的、可鍛造的——

我們總認為，身體祇服從生理規律，無歷史可言，這又錯了。身體處於流變過程中，它順應於工作、休息、慶祝的不同節奏，它會因藥物、飲食習慣和道德律等所有這一切而中毒，它自我阻抗。⁽⁷⁾

正是這種身體的可變性，使歷史事件的發展有了場所和機會，並得以產生效果，影響歷史的進程和發展。運用某種策略和方法，對身體進行改造、處置和訓練。身體的可變性恰恰預示了歷史的可變性。

從“身體”的視角和向度來看待歷史，同時也將歷史的目光更多地投向身體，投向底層人物和邊緣群體，投向歷史事件中的小人物，恢復身體以及身體的物質性，恢復它們本來面目和自身

張力，恢復它們自己的歷史痕跡和歷史效果；而傳統歷史學相反，它將目光投向上層人物、精英群體和重大的歷史事件。在“身體”史學的宣導下，除了可以讓我們對過往的史實有更多面的認識外，也可以讓我們對許多過去視為零散、索然甚至不相關的史事，有一份新的體察和警惕，警醒到其間可能存在的連續發展。正如馬克思所言：

既然人天生就是社會的生物，那他就祇有在社會中才能發展自己的真正天性，而對於他的天性的力量的判斷，也不應當以單個人的力量為準繩，而應當以整個社會的力量為準繩。⁽⁸⁾

在馬克思這裡，身體和歷史就形成了一定的辯證關係，具有社會性。本文研究的着力點即以此出發，對“清末民初的軍國民運動與民族覺醒”這一歷史事件進行考察。

二

在晚清思想文化界，“身體”從一開始就是作為一個象徵性的話語符號被關注和對待，並伴隨着晚清中國關於現代民族國家建構的整個過程而生產。值得注意的是，身體話語在晚清思想文化界生成與流行過程中表徵出的一個重要內容是“身體改造”。“身體改造”體現出晚清國人對民族自身弱點的審視、反省、考量與重構。然而，強烈的身體國家化的意識和意圖，在從強國保種到新民、軍國民、女國民等晚清政治話語實踐等諸個場域中被表現，並不斷被賦予沉重的符號意義作為晚清民族國家想象的載體，它不僅主導了晚清國人構建現代國家的路徑，還直接開啟了在意識形態異常濃厚的民族主義旗幟下進行國民改造的啟蒙工程，從而將近代國民的蘇醒作為其重要內容之一進行構建。

就身體話語的生成意象來言，晚清最具典型意義的話語符號是“東亞病夫”或“東方病夫”。

這兩個詞彙的出現與“睡獅”等喻說的出現不約而同地都屬於近代思想史上重要的文化事件或社會事件，共同書寫着晚清國人與外國人眼中的中國形象與影像，但他們的衍用成風卻又出人意料地有一個逐漸持續發酵的過程。通常認為，“病夫”是外國人以西方人的種族優越感對梳辮子、抽鴉片的中國人極其漫畫化與妖魔化的蔑稱。而事實上，最初“病夫”一說搖曳出現時，並非指稱中國人，其指代的對象反而是國家機制幾近崩潰、國勢日趨衰弱乃至正遭受列強荼毒、國民日漸沉淪、國土日削月割的“中國”這個國家政體。與西人妖魔化國民進行抗爭的是一批深受西學濡染的晚近智識分子。1895年3月，嚴復在天津《直報》上發表〈原強〉一文，最早將國事與“身體”作了連結：

今夫人之身，情則寡，勞則強，固常理也。而使病夫焉日從事於超距贏越之間，則有速其死而已。中國者，固病夫也。⁽⁹⁾

這被認為是最早用“病夫”喻說中國的文字。兩年後，梁啟超援用了嚴復的說法：

今日之中國，則病夫也。不務治病，而務壯士之所行，故吾曰：“亡天下者，必此言也。”⁽¹⁰⁾

這樣一套語言表述，讓我們看到了借身體思考與言說國事的一種思維方式，“身體”也由此堂而皇之地進入政治場域，開始承載一個新時代國家的內涵，表述了晚近智識分子對於近代國民的希望。顯然，“病夫”並非中國人“自我東方化”的一個結果，而反映了晚清國人以此鞭策自身以圖變革自強的強烈願望。蘇珊·桑塔格認為：

現代疾病隱喻使一個健全社會的理想變得明確，它被類比為身體健康，該理想經常具有

反政治的色彩，但同時又是對一種新的政治秩序的呼籲。⁽¹¹⁾

鴉片戰爭以來，自大的帝國不斷遭受外來的侵略和擴張，特別是《馬關條約》的簽訂以及後來的瓜分狂潮的延伸即八國聯軍侵華戰爭，更使中華民族瀕臨亡國滅種的邊緣。種族生存的危機感讓晚清國人不得不產生自省和自強意識，中華民族開始覺醒。由此看來，現代國人身體生成直接伴隨着晚清精英對於現代民族國家的重構，伴隨着民族的重塑與蘇醒。通過對近代中國屢戰屢敗原因的反思，當時的一些有識之士開始透過器物、制度層面深入到文化精神、民族性格等方面尋找原因。他們逐漸認識到中國軍事失敗和國家淪亡不僅是落後的軍事、低下的國民素質，軍人和國民的怯弱與麻木也是重要因素。於是，國民性改造問題開始受到關注，將病弱國家改造為健康國家，將衰弱的國人改造為強健的國民就成為精英們當時的理想，“軍國民運動”隨之搖曳而生。

三

就“身體”生成⁽¹²⁾的角度來看，19世紀末、20世紀初葉的中國智識界精英確實對身體有着一份高度的着迷與堅持。從康、梁這一輩開始，智識分子就以一種憂國憂民的態度，致力於推動各種身體改造運動，營造一個有關“身體史學”的大敘事（grand narrative）。而當權者也為了自身政權維繫的考量，陸續以改良的名義推廣這項事業。

1895年，康有為在〈上清帝第二書〉中便主張“以民為兵”，並建議開設“學堂學習步陣、騎擊、測量、繪圖”，“以強天下之勢”⁽¹³⁾。儘管康有為沒有直接提出對國民的身體進行改造，但把國民改造成為軍人其實已經表明了康氏的國民身體改造的態度。軍隊顯然比普通國民更具有強健的身體素質，軍人尚武、好戰、勇猛，具有

開拓和討伐精神。後來，康氏多次在文章中表露了他對未來國家、國民的想象，極力主張培養國民尚武之精神，並要求國民接受正規軍國教育，在小學階段就應該接受各種軍事訓練，以達到“動盪其血氣，發揚其身體”⁽¹⁴⁾的目的。故此，可以說，始於新身體的國民改造運動其實早在維新期間就已開啟，訓練新軍，宣導男子斷髮易服，女子廢纏足，諸如此類的政治話語實踐和嘗試，無不印證着晚清智識精英改造國民身體的一種自覺與努力。

作為康有為的弟子，梁啟超後來大聲疾呼、努力宣導的“新民”、“尚武”的主張固然是他維新期間“強國”、“強種”⁽¹⁵⁾思想的延續，餘波流繞，至今不絕於耳，但同時也顯示了他吸收了康有為思想中有用的部分並且作了適當延伸、發展與改造。梁啟超提出與“智力德”一脈相承的“新民說”，並強調“苟有新民，何患無新制度、無新政府、無新國家？”⁽¹⁶⁾就梁啟超的新民說而言，進行國民改造當然是全面而不僅僅是僅止於國民身體的，他還呼籲從國民精神、道德、品格等方面，如公德、國家思想、進取冒險、權利思想等着手，強調在自由、自治、進步、自尊、合群、生利、分利、毅力等方面，對國民素質加以脫胎換骨的改造或蛻變。

如果說梁啟超對於“新民”注重的是國民之精神、意識、行為之改造，對於國民之身體顯然不在重點關注之列，那麼，蔡鐸則是高舉“軍國民主義”之大纛，把國民“身體改造”當作振興國家之癥結所在之第一人。蔡鐸是湖南寶慶（今湖南邵陽）人，自小就受到湖湘文化的影響。在湖湘文化中，“霸蠻勁悍、尚武任俠”的民風，“心懷天下、勇於獻身”的愛國情操和“關注現實、體用結合”的經世學風都深深地影響了少年蔡鐸。敏而好學的蔡鐸完全繼承了湖湘文化的精神財富，他不但傳統文化修為深厚，而且吸收大量的西方文化。1899年，蔡鐸應梁啟超之邀，東渡日本求學，就讀於東京大同高等學校、橫濱東亞商業學校等。這段經歷是他人生中最寶貴的財

富。他比同齡人更為廣闊地去看世界，研究政治、哲學，並補習普通學科。在日本留學期間，蔡鐸等感受了當時日益強大的日本帝國的尚武精神，和貫穿其中的大和之魂，瞭解到了西方和日本的國民教育及民族精神。他學習和宣傳日本的新思想新科技，強調要給國民以軍事教育、軍事訓練等，以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

1902年2月，蔡鐸以“奮翮生”為筆名在《新民叢報》上連續幾期刊載他的著名檄文〈軍國民篇〉，至此，“吾國‘軍國主義’之輸入，以此為篙矢”⁽¹⁷⁾，“軍國民化身體運動”粉墨登場，凸示一個“建立在身體改造上的真理性聲稱(truth claim)正在中國誕生”。⁽¹⁸⁾

體魄之弱，至中國而極矣。人稱四萬萬，而身體不具之婦女，居十之五；嗜鴉片者，居十之一二；埋頭窗下、久事呻吟、龍鍾憊甚而若廢人者，居十之一。其他如跛者、聾者、盲者、啞者、疾病零丁者，以及老者、少者，合而計之，又居十分之一二。綜而核之，其所謂完全無缺之人，不過十之一而已。此十分之一中，復難保其人人孔物可恃。以此觀之，即歐美各強棄彈戰而取拳鬥，亦將悉為所格殺矣。⁽¹⁹⁾

蔡鐸指出在晚清實行“軍國民”運動以改造國民身體的必要性和急迫性：“居今日而不以軍國主義普及四萬萬，則中國其真亡矣！”⁽²⁰⁾他還列舉外國人的先進經驗，特別是對日本的軍國主義十分推崇，相對於日本“國民皆兵”，中國卻是“堂堂中土，欲求一骯髒丈夫，如東西各強國之所謂國民兵者(東西各國，凡為兵者，須先檢查其體格、體力、目力、耳力、呼吸力等)，豈可得哉？”⁽²¹⁾

在蔡鐸的煌煌大論中，讀者完全可體會出晚清智識精英於民族危亡情勢下希望經由新身體從而造就新國民這一訴求的急切心理和迫切願望。

這個以國魂為召喚、以身體的軍事化開發、改造作為訴求和主張，毫不遮掩地呼籲中國應該將身體視為國富民強的根本基礎。他的言談除了獲得其他智識分子的回應外，更成為往後十餘年制度化教育發展的重要指標。這種以“身體改造”作為主要訴求、以國富民強作為最終目標的發展，顯示精英群體正試圖透過他們所能掌握的文化、符號和言談資本，將國民的身體做一次根本的改革，使身體與民智的發展不再處於間隔的狀態，而是有機地結合成為一個整體。⁽²²⁾

四

以〈軍國民篇〉的發表為契機，以“身體改造”為初衷的“軍國民運動”迅速在社會上流播開來。同年，蔣百里在《新民叢報》發表提倡軍國主義的〈軍國民之教育〉一文，論證在中國對國民進行軍國民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要求國民進行“身體改造”，以適應社會和世界形勢的發展。

繼蔡鐸、蔣百里宣導軍國主義後，由清末到民初，軍國民教育思想逐漸為社會各階層所接受，並迅速傳播和擴散，一時之間，主張實施軍國民教育的人越來越多，並逐漸得到政府的提倡、鼓勵與支持，成為一種救亡圖存的運動。

政府行為的開風氣者是袁世凱。1902年，袁世凱以直隸總督之便，擬訂小學堂、中學堂及師範學堂的暫行章程，並依學生的年齡分別授以柔軟體操、器具體操、兵式操等，對學生加強身體鍛造，磨練學生體格，以強身健體，這可以說是“身體改造”在普通學堂實施的肇始。隨後，清政府頒佈由張百熙擬訂的〈欽定學堂章程〉，規定各級學堂應添加體操課。這一學制雖然是清廷注意軍國民教育、加強學生“身體改造”的開始，但一年後即廢除，可謂淺嘗輒止。1906年，清廷要求各地學堂做行西方國家的軍國民思想，

凡中小學堂各種教科書，必寓軍國主義，俾兒童熟見而習聞之。國文、歷史、地理等科，宜詳述海陸戰爭之事蹟，繪畫炮臺兵艦旗幟之圖形，叙列戎窮邊使絕域之勳業；於音樂一科，則恭輯國朝之武功戰事演為詩歌，其先後死綏諸臣尤宜鼓吹挖揚，以厲其百折不回視死如歸之志；體操一科，幼稚者以遊戲體操發育其身體，稍長者以兵式體操嚴整其紀律，而尤時時厲以守秩序，養成威重，以造成完全之人格。⁽²³⁾

在這裡，“身體改造”成為國民人格塑造的重要組成部分。“身體改造”既包括軍事知識的學習，也包括“視死如歸之志”的精神和意志的鍛造。清廷這一時期的軍國民運動對國人“身體改造”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民國初創，學校教育宗旨一時難以確定，但教育部公佈的教育暫行辦法中仍規定：“高等小學以上體操科，應注重兵式。”由此可見政府對軍國民教育、國民身體改造的重視。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軍國主義色彩較為濃厚的德國在戰爭初期勢如破竹、銳不可擋，如此結果令一向崇尚文弱書生、胭脂粉墨的國人紛紛嚮往軍國民教育，積極主張加強身體磨礪。范源廉在〈今日世界大戰中之我國教育〉一文中直指“武”事，積極主張廢除賤武積習，鍛造強壯之體魄，要求“振起學者尚武之精神，又當務之急也。惟在吾國而言尚武，苟不先除文弱之積習，則亦空言無效。故必當使學者知人而文弱，即為不幸，安於文弱，尤為可恥”，宣導全國皆兵制度，並以之為“充實國力最好制度”，國人尚武之風一盛，身體將強壯如西人，則能“執干戈以衛社稷，正吾輩人人之義務也”。他還批評那些不以身體鍛煉為目的的人，“夫不武者不足以為國民，不武者不足以為男子”。⁽²⁴⁾ 時任教育總長的湯化龍亦訓飭令各學校——

自歐洲戰禍波及遠東，此乃我全體國民增進行憲術智之日，世界經一次戰事，各國之社會狀態與學術思想之趨勢即增一經驗，此戰局

貽留教訓我國人者至深且大，全國學子須深自省覺，知處此國競爭時代必實踐。⁽²⁵⁾

要求全體學生注重身體鍛煉，學好武藝，培養軍人氣節，保衛國家。

1915年7月，國民政府先後頒佈了〈教育部公佈國民學校令〉、〈教育部公佈高等小學校令〉、〈教育部公佈預備學校令〉等法令，要求各級各類學校習普通體操、兵式體操，並於高等學校開設軍事課程，養成強健體魄與堅定心志，以洗文弱積習。

綜上所述可知，民國初年，為培養武勇剛健之國民，以挽救民族危亡，抵禦外侮，在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宣導下，軍國民教育思潮在學校和社會各界得以廣泛推行，成為主流，軍國民運動風行一時。

與政府行為齊頭並進的是民間行為，其中，新聞傳媒扮演了重要角色。一些報刊雜誌紛紛加入這一運動，大肆鼓吹軍國民運動，要求國人進行“身體改造”。據《中國近代期刊編目匯錄》不完全統計，宣傳與闡發這一思想的報刊有《申報》、《大公報》、《新民叢報》、《政藝通報》、《第一晉話報》、《南洋兵事雜誌》、《同庭波》、《經濟叢編》、《遊學譯編》、《童子世界》、《廣益叢報》、《江蘇》、《覺民》、《東方雜誌》、《俄事警聞》、《警鐘日報》、《武備雜誌》、《萃新報》、《直隸教育雜誌》、《競業旬報》、《牖報》、《武學》、《安徽白話報》、《民心》、《進步雜誌》、《中華教育界》、《雲南教育雜誌》、《湖南教育雜誌》、《湖北教育雜誌》、《武德》、《平論報》、《（杭州）教育週報》、《教育研究》、《紹興教育雜誌》、《（商務）教育雜誌》、《陝西》、《教育今語雜誌》、《麗澤隨筆》、《蜀報》、《北洋政學旬報》、《南風報》、《大中華教育雜誌》、《國學雜誌》、《復旦》、《環球》、《民鐸》、《同德雜誌》、《公民週刊》、《戊午週報》等四十餘家，共刊發宣傳軍國民主義方面的文章近

兩百篇。⁽²⁶⁾當然，參與這一運動的報刊雜誌不止於此，尚有《雲南》、《中外日報》、《神州日報》等。

在〈論尚武主義〉一文中，作者認為國家強弱全在於民眾尚武與否，在於民眾身體強壯與否，欲救中國，欲自強，必須發揚國民尚武精神，鍛造國民治身體，“重軍人名譽，高軍人位置，興軍國民之教育，長武士道之雄風，以戰死為無上之快樂，以敢死為無上之道德，以服兵役為國民應有之責任”⁽²⁷⁾。如此，則國民身強體壯，可以保種、保國、一雪國恥。錫鑫的〈教育家對於國家社會之責任〉一文，更是強調身體磨礪的重要性，力主軍國民教育：

對國民體育，務使一般國人知國家勢力之強盛，全在國民體魄之強固，國防之海陸軍士，皆為國民所必須，而群致力於軍國民教育之準備，並遍設體育會以謀國民體格之健全。⁽²⁸⁾

在以“身體改造”為目的的軍國民教育思想的影響下，在政府提倡、鼓勵與報刊大力宣傳下，各地的軍國民教育會如雨後春筍般地成立：愛國學社、河南體育會、奉化教育研究會附體育部、杭州教育會、江寧學會、江蘇學會、紹興體育會、上海商團體育會、上海體操遊戲傳習所、滬學會體育部、商餘學會、商學補習會、滬西士商體育會、杭州體育會、女子體操傳習所、上海體操研究會、上海商業體操會、蘇商體育會、上海北區華商體操會、上海南區商業體操會、浙江新黨體育會、安徽學會、廣東體育會、廣東松口體育會、上海體育會、重慶體育會、上海體育會、上海華商體操會、上海商業體操會、上海精武體操會、滬商團體育會、杭垣國民尚武會、天津體育社、天津辛亥俱樂部、商務印書館體育部、湖南體育會、浙江士商體育會、江蘇農餘體育會等。⁽²⁹⁾上述團體的活動宗旨也大體體現了尚武、對國民進行身體改造、軍事訓練、提高民眾軍事素質這一要求。

餘論

1919年，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硝煙漸行漸遠時，飽經戰亂之苦的世界各國各界人民開始傾向穩定、和平的生活，國際聯盟及一些世界性組織亦多方宣傳，積極提倡和平，國內不少人更是認為世界大戰將不復存在，以為軍國民運動已經不合於世界潮流和發展方向，其生存土壤已不復存在，故主張廢除之：“歐戰告終，軍國主義受人詬病，民治主義盛極一時，故八年四月教育調查會‘就世界教育之趨勢、吾國民治根本着想’”⁽³⁰⁾。主張以實利主義取代軍國民教育：“雖然，今之世界，所恃以競爭者，不僅在武力，而尤在財力。且武力之豐，亦由財力而孳乳”，“侈言尚武，則大亂隨之。古今中外斷無無財而可以強兵之理。況今世戰爭，恃力才三，而恃財者七，無則任何勇武之國民，必不足以取勝。此軍國主義之有恃乎實利主義者一也。”⁽³¹⁾同年4月，教育調查會在建議案中指出，軍國民教育不合民主本意，已為世界所公認。我國教育宗旨，亦應順應潮流，有所變更。“民八（即1919年）歐戰停止，威爾遜底國際和平高唱入雲，大同教育思想於是盛倡。”⁽³²⁾1920年，全國教育聯合會議決然廢除教育宗旨中有關軍國民教育的內容。

至此，轟轟烈烈的以“身體改造”為主要內容的軍國民運動塵埃落定。其間，軍國民運動從話語層面進入到實踐層面，個中包含着精英與底層人物的社會各界均參與之，且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國人均試圖通過“身體改造”進而救國救民、抵禦外侮的意圖可見一斑。不可否認，“身體改造”明顯隱含着將“新身體”作為國民自強的邏輯前提，且其最終旨歸是“新國家”的思想理路，而正是在國民品格的現代建構中，現代中國人身體形成的前提下，現代國民的內涵才不至流於空泛。但另一方面，盛極一時的“新民”、“軍國民”等運動，從口號的提出到具體實踐，都是為了建構以“尚武”、“體育”

為內涵的中國人理想的“身體”，其間包含着對日本、德國等軍國主義的崇拜、癡迷與想象。再有，這一系列運動的發生其實並不意味着身體從此在中國獲得了更為自主、開放和廣闊的空間。因為這種想象是沒有事實基礎的，現實顯現的是，這種工具化身體的存在、使用和演變，受到當時諸多條件的限制，包括道德、國情、世情和民情，其中救亡的壓力權傾朝野，救亡雖然有助於化滅舊有道德和倫常體系對“身體”的襲斷、控制與支配，但也在這個過程中賦予身體許多新的政治使命和倫理目的。然而不管怎樣，整個過程表明，晚清中國是近代“身體生成”的起始語境，主流話語對身體進行銘刻的痕跡非常明顯，從對舊身體的改造，到學校教育對新身體的規訓與型塑，實際都引導着對國民身體加以國家化和社會化的意圖，這標誌着以民族主義、國家主義作為思想核心的中國近代身體觀開始正式形成。

【註】

- (1) 學術界關於“軍國民運動”的解讀有分歧，謝本書認為應該為“軍國主義”（見謝本書：〈論“軍國主義”〉，《貴州社會科學》1989年第10期）；黃金麟則認為為“軍國民運動”，且持續時間較長，為1902-1919年。（見黃金麟：《歷史、身體、國家——近代中國的身體形成（1895-1937）》，臺北：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頁19。）本文取後者釋義。
- (2) 相關研究有：姚霏：〈近代中國女子剪髮運動初探（1903-1927）——以“身體”為視角的分析〉，《史林》2009年第2期；張德安：〈身體的爭奪與展示——近世中國髮式變遷中的權力鬥爭〉，《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7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侯傑、胡偉：《剃髮·蓄髮·剪髮——清代辦發的身體政治史研究》，《學術月刊》2005年第10期等。
- (3) 黃金麟：《歷史、身體、國家——近代中國的身體形成（1895-1937）》，臺北：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頁4。
- (4)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頁341。
- (5) (6) Foucault, Foucault Live. Semiotext. 1989. p. 186-187; p. 151-152.
- (7) 杜小真編：《福柯集》，上海：上海遠東出版公司1998年版，頁157。
- (8) 馬克思：〈神聖家族〉，《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頁167。
- (9) 嚴復：〈原強〉，《論世變之亟·嚴復集》，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頁18。
- (10) 梁啟超：〈變法通議·續論變法不知本原之害〉，《梁啟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頁15。
- (11) 蘇珊·桑塔格：《疾病的隱喻》，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年版，頁68。
- (12) 按照黃金麟先生的理解，“身體生成”這個概念指的並不是一種身體的生物性誕生或創造，而是指一種在肉體既存的情況下所進行的政治、經濟、軍事、社會和文化創造。
- (13) 湯志鈞：〈上清帝第二書〉，《康有為政論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版，頁120。
- (14) 康有為：《大同書·小學院》，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5年版，頁120。
- (15) 梁啟超：〈醫學善會敘〉，《梁啟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頁141。
- (16) 梁啟超：〈新民說·論新民為今日中國第一急務〉，《梁啟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頁655。
- (17) 李文漢：《蔡松坡年譜》，1943年石印本。
- (18) (22) 黃金麟：《歷史、身體、國家——近代中國的身體形成（1895-1937）》，臺北：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頁4。
- (19) (20) (21) 曾業英編：《蔡松坡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頁15；頁24；頁24。
- (23) (24) 舒新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上冊，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頁220；頁1055。
- (25) 〈湯總長訓飭各學校〉，《順天時報》，1914年9月23日。
- (26) 參見上海圖書館編：《中國近代期刊編目匯錄》，頁2，3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 (27) 〈論尚武主義〉，《新聞報》，1905年4月5日。
- (28) 錫齋：〈教育家對於國家社會之責任〉，《（商務）教育雜誌》，第7卷第9期。
- (29) 參見朱英《辛亥革命時期新式商人社團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何啟君等：《中國近代體育史》，北京體院出版社1989年版；大學東方文化研究所：《東方文化知識講座》，安徽黃山書社1988年版；唐振常：《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崔樂泉：《中國近代體育史話》，中華書局1998年版；《東方雜誌》第1至5卷。
- (30) (31) (32) 舒新城編：《近代中國教育思想史》，上海：中華書局1932年版，頁236；頁143、頁140；頁16。